

习近平家语

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全社会

做表率。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页

美思录

李婉鑫 杨雪燕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以及日趋旺盛的托育服务需求,“一老一小”服务的有效供给面临巨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一老一小”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完善人口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推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统筹规划、一体实施、协同发展。

作为一种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及托育服务供需失衡的创新模式,老幼同养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所谓老幼同养,指的是在地理空间上紧邻设置养老设施与幼儿设施,双方在统一机构管理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代际互动,最终实现老幼群体的互惠互利。

国外老幼同养模式已发展成熟,如美国圣文森特代际学习中心将养老院和幼儿园放置于同一栋楼中,为老幼群体共同学习、情感交流以及公益活动提供重要的室内共享空间。德国的利多多代屋在共享物理空间的基础上,为不同代际群体提供公共开放空间,以开展社区层面的生活帮助、服务支持与社会参与。新加坡的海军部村落则是一个集老年公寓、医疗康养、托育服务、商业娱乐等为一体的公共建筑综合体,通过层次分明的交通串联和功能空间的交叉布局,实现自发的老幼群体代际互动。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老幼同养模式,分别在武汉、南京和贵阳出现了三家老幼同养机构。但运行过程中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南京锁金村第一幼儿园从2002年开始尝试在幼儿园中建设养老院以实现老幼同养。实践发现,由于老幼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在饮食、安全与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不尽相同。机构工作人员多为幼教出身,在照料老人方面缺乏经验,在日常工作中也难以做到老幼兼顾。同时,老年人有家属探亲需求,而社会人士的随意出入会给幼儿带来安全隐患。此外,老年人去世也成为困扰该机构的一大难题。由于我国的生命教育相对滞后,幼儿不理解死亡,老年人的“突然消失”会给幼儿带来一定的心理创伤,幼儿家长对此产生疑虑与恐慌。最终,该机构关停了养老院部分。

以相同模式开展老幼同养实践的武汉童心苑也面临着类似问题,但他们探索出了一条相对成功之路。在人员配置上,童心苑有两套不同的管理人员分别负责老人和幼儿的日常生活与照料护理;在空间上,老人和幼儿的生活区域彼此独立,有各自的厨房、餐厅与活动区域,双方不能私下接触;在制度规定上,童心苑设置了一整套关于入院流程、入院筛选、资产管理以及紧急情况预案等管理规范,并对离世老人的后事处理予以特殊规定。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童心苑的安全性、规范性与专业性。

但是,童心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老幼互动模式上,有些活动设计缺乏科学性,老幼群体虽有接触和交流,但并未做到真正共融。其次,两套管理人员意味着两倍开支,财政支持不足,只能勉强达到收支平衡,这势必影响其未来的长远发展。

综上,笔者认为,阻碍我国老幼同养模式发展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专业人才短缺。我国缺乏能够同时照顾老人和儿童的复合型、专业化人才,这不仅增加了机构运营成本,也为合理设计老幼代际活动带来障碍。二是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对老幼同养的发展规划、运营标准、监督管理等做出详细规定,无法引领老幼同养机构规范化发展。三是社会认可度较低。我国社会层面尚未形成老幼代际融合的价值理念,部分幼儿父母对老人存在消极印象,对老幼同养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较低。四是协调发展不足。我国目前的老幼同养基本依靠机构自主发展,导致其在应对危机事件时力量不足,影响机构长远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

第一,加强宣传倡导,提高社会认知。政府应加大对老幼代际融合理念的宣传和推广,为老幼同养模式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创新宣传方式,提升老幼同养的社会接纳度。

第二,完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支持。我国政府应尽快制定并推行老幼同养领域的相关政策。首先,出台指导意见,明确促进老幼同养模式发展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其次,出台老幼同养机构的设置标准与管理规范,对场地设施、人员规模以及监督管理等进行统一标准设置,促进老幼同养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由于养老和托育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为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推诿,相关部门机构应增强沟通与合作,统筹规划老幼同养模式发展。

第三,加强人才培养,建设专业队伍。首先,培养复合型人才,在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中开设老幼同养相关课程,进行理论指导与实践培训,培养能够同时兼顾养老和育儿的复合型人才。其次,应加大对现有养老服务人员和托育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最大限度发挥现有人员优势,提升其专业能力,缓解短期内人才短缺的压力。最后,完善激励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与福利待遇,并对其就业、社保等提供优惠政策。

第四,多元主体参与,共谋发展之路。首先,政府在老幼同养模式的发展进程中扮演好引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协调统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老幼同养实践。例如,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先行实践老幼同养模式;此外,欢迎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民营机构积极参与老幼同养探索,政府在此过程中提供支持,加强监管,保障服务质量。其次,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为老幼同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技术指导。同时,对老幼同养机构进行服务效果评估,从更科学专业的角度指导老幼同养实践发展。最后,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采用政企合作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拓宽资金来源,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共同助力我国老幼同养模式长远发展。

(作者李婉鑫系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在读博士生,杨雪燕系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一老一小」双龄共养新模式的探索与展望

家视界

多地公布的结婚登记数据显示,女方大男方1~4岁的占比达两成

“姐弟恋”:幸福没有标配

女性大1~4岁的占比43.03%,女性较男性大1~4岁的占比第二,为22.66%。在安徽省2021年结婚登记数量中,女性较男性大1~3岁的占比为22.1%,同样超过两成。

无论是真实世界里的数据,还是周围亲戚朋友的案例,抑或是影视作品中的艺术虚构,近年来,“姐弟恋”的故事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

“女方年龄比男方大的结婚登记数量虽然没有显著的上扬趋势,但却可以明显感觉到‘姐弟恋’的氛围有所松动,婚恋文化呈现多元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在查阅多项调查后表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现象,体现了整个社会更加包容和多元,也说明了我国国家的整体富裕程度达到了一定水平,人们对婚姻质量的需求更加个性化。”

“这是一个好现象。”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督导师魏湘肯定地说,当大家觉得周围的“姐弟恋”越来越多,但又不那么显眼的时候,说明整个社会和每个人都在成长和进步。

对于“姐弟恋”的态度褒贬不一

对于和比自己小8岁的男朋友谈恋爱,35岁的任静坦言,“两个人在一起很轻松,感觉有点甜。”

任静的前一任男朋友是自己的同学,相处久了,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的你对我错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现在这个小男友是朋友的朋友,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渐渐产生了感情。“开始我是有点抵触的,想着怎么也不会跟‘小屁孩’谈恋爱,但他的单纯、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我。”

在日常交往中,任静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在外表上可以和小男友更匹配。小男友比较听话,也比较黏人,遇到什么事都会主动跟任静说,任静也会用自己相对丰富的经验和经历来“指导”他。“他虽然年龄小一些,但很懂事,很重视我的想法,还经常带我去一些好玩的地方打卡。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打算继续交往下去。”

“我比我爱人大5岁,我们很幸福。现在的婚姻不是谁对谁的依附和照顾,而是彼此包容、互相成就,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年过四旬的方丹对记者说。今年刚好是方丹和爱人结婚十周年,一脸幸福的方丹打趣地说:“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多5岁,所以我们刚刚好。”

尽管甜蜜的“姐弟恋”不在少数,但在微博相关话题的留言中,网友对此的态度依然褒贬不一:“20多岁的男孩从稚嫩到成熟是要用女孩的很多眼泪换来的,如果可以,还是不要开始一段年龄差比较大的‘姐弟恋’。”“‘弟弟’把我们的事告诉了家里,他妈妈不同意,他和家里吵得很激烈,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一定所有比你小的男生都没有你成熟,我的‘弟弟’就十分可靠。”“年龄大一些的女生,更讲道理、更好沟通。”“生活中很多‘姐弟恋’都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也有些摇摆不定,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矛盾,但不确定是否要继续。”

“客观地讲,‘姐弟恋’确实有利有弊。”魏湘说,年龄较大的女方更有生活和社会经验,可以给男方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把生活规划得更好,有利于婚姻和恋情的稳定。但与此同时,在各方面较为成熟的女方也会给男方带来压迫感。另外,亲朋好友的一些负面评价也是现实存在的。

“但如果协商好,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年龄不是限制婚姻的主要因素,我周围也有婚姻美满幸福的‘姐弟恋’

朋友。”魏湘表示。

女性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提升是主因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是家庭中效率最高的组合,但对于情感要求就会降低一些。如今,社会整体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婚恋中,人们更想要追求的不是物质利益最大化,而是情感的回报。”对于日渐普遍的“姐弟恋”,刘汶蓉分析。

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女性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提升,刘汶蓉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择偶标准有所改变。以前只看重经济标准,也就是对方养家的能力,现在女性自己也挣钱了,男方的经济条件就不再是唯一标准,婚姻选择的可能性多了起来。”在刘汶蓉看来,传统观念中的“女大三抱金砖”更多体现的是女性的付出和牺牲,现在的“姐弟恋”则是女性的自我满足和实现。

刘汶蓉也认为,在教育、信息和沟通越加充分的今天,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大家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就越来越开放和包容。

时常有来询问“姐弟恋”问题的咨询者,魏湘每次都以中立者的身份理解双方,在此基础上耐心分析,并给予引导。她认为,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价值观要相符合,这也是如今越来越多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现在的女性更注重情感的共鸣和契合度,更倾向于选择能够跟自己一起实现自我价值的伴侣,年龄等外在因素逐渐成为次要因素。”魏湘强调,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提升,越独立越自信,就越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从男性的角度来看,魏湘说,很多时候年轻男性也希望找一个可以引导自己或者给自己成长带来启发的人。

尽管如此,刘汶蓉直言,“姐弟恋”的比例不会太高,因为女性年龄大很多可能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而这并不符合目前大多数女性的择偶初衷。“现在年轻女性结婚生子都觉得压力大,更不会去找一个让自己承担照顾责任的伴侣了。多数女性找男友的初衷,一定是想让自己更快乐、更自由、更放松。”

用心找到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

任何婚姻都需要经营,只要用心找到彼此舒适的相处模式,都可以长久幸福。

对于“姐弟恋”的经营方式,魏湘表示,和所有婚姻关系一样,有效沟通必不可少,而当双方年龄相差比较大的时候,这一点更为重要。“在沟通的基础上,要做到相互尊重和支持,‘姐弟恋’更容易引起外界的质疑和议论,这时候就更需要彼此的扶持和信任。”

魏湘谈到,婚姻不能长久的一个原因是,一个人向前发展,另一个人还停留原地。能够共同成长的婚姻才更稳固。她因此建议,在“姐弟恋”中,男方要努力成长和探索,女方要给男方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双方向着一致的生活目标前行和发展,更容易构成和谐长久的亲密关系。

刘汶蓉强调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婚姻会更加注重情感化和心理化,所以双方一定要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心理调适。比如在“姐弟恋”中,女方既然选择了年龄小一些的男方,就要做好接纳他也有可能不成熟,要意识到婚姻中必然存在的客观问题,有意识地去解决、经营和维护。同时,作为婚恋模式的“少数派”,还要提前做好承受来自社会压力和父母压力的准备。

“对于‘姐弟恋’,既不要过度美化,也不要过于悲观。”刘汶蓉说,她希望整个社会对“姐弟恋”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尊重,“大家要转变传统观念,对于幸福婚姻的模式不要太固化,因为幸福没有标配。”



《小丈夫》



《小丈夫》剧照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在我国,“男大女小”的婚姻一直占据主流,而随着社会进步、婚恋观的改变,近年来,“姐弟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可,从多地公布的婚姻大数据便可得到印证。为什么周围的“姐弟恋”越来越普遍?反映了人们怎样的心理变化?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体现了社会更加包容和多元

今年初,杭州市民政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冲上微博热搜。该数据显示,从2022年杭州市结婚双方的年龄差来看,男方年龄大于女方的有28674人,占男性结婚总数的43.9%,依然是主流。而女方大男方1~4岁的有12612人,占比19.31%,这个数字不但超过了男女同龄的结婚登记数,比2020年、2021年杭州“姐弟恋”的10827对和11427对,也有所增加。

2022年江苏省结婚登记男女年龄差的结果是,男性较

家庭工作创新案例调研行

福建省福州市妇联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

做好“家”文章 涵养新风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李菁雯

各级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绿色家庭8.5万余户,好家风好家训6万余条;在全国首创“入户早教指导员”职业工种,培训入户早教指导员2228名,开展公益早教进万家活动700余场次,累计服务婴幼儿家庭3.5万余人次;线上线下家长学校公益讲堂年均培训家长近300万人次;家风家教基地280个……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福建省福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获悉,过去五年,福州市妇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抓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回应广大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思想引领,倡导家庭文明新风尚

近日,福建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与福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最暖万家灯火处”八闽家主题影像故事展,一批福州市优秀家

庭代表获赠“八闽家庭福卡”。该卡为全省首发,惠及福州市约450万户各类先进家庭,可享受体检、保险、信贷等多重礼遇,营造德者受尊、争当先进的氛围。

通过选树“最美家庭”、讲述“最美家庭”家风故事,不断弘扬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家风。2022年,共推荐产生各级最美家庭、五好家庭5987户,产生各级绿色家庭126435户。

在构建多元“家风”文化阵地方面,市妇联建立“新时代家风传习中心”,联合各级各部门深入挖掘闽都文物古迹、历史名胜、古厝名居等蕴含的家风家教资源,打造了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中国船政家风家训馆、三坊七巷名人家家训馆等家风家教基地280个,2022年开展家风家教主题宣讲实践活动3000余场次,服务200多万人次。

统筹协调,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

市妇联在全省率先建立家庭教育联席会议,将家庭教育纳入儿童友好城市创建和妇联系统“八五”普法重要内容,并纳入新一

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中。市直12部门联合制定家庭教育五年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全市家庭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

精准选取项目,纳入公共服务体系。2022年市财政增加了130万元家庭教育专项经费。把市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进基层和关爱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列入全市妇联系统“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带动社区、村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4600场次,受益家长23万人次。

推动全市社区和建制村家长学校建设,组建率达100%和94.85%。晋安区打造家庭教育“十个千万”工程,通过搭建一个多元化的家庭教育学习平台,开展十项家庭教育系列活动,遴选一百所家庭教育特色学校,培训7000名在职教师获得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发动和鼓励10万个在校生成家共同参与家庭教育系统学习,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

“研究会志愿宣讲员已发展到100多人,今年计划进乡村、社区、学校开展百场系

列公益讲座,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福州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学博士曹文玲表示。

服务保障,增进妇女儿童新福祉

市妇联做实婚姻家庭服务,建立反家庭暴力工作联动协作机制、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咨询机制,健全市县乡村四级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网络,聘任“茉莉姐姐”家事调解员3276人,春蕾安全员2922名,年走访摸排1.1万多次,摸排化解婚姻家庭纠纷隐患户671户,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心理辅导、婚姻家庭经营指导等服务485件,直接服务4000多人。

2022年以来,市县两级妇联共筹集项目资金244.12万元,设计实施家庭教育、家庭健康、家庭关爱、婚姻家庭指导等服务项目34个,累计服务妇女儿童10万多人。

此外,募集294.4万元资金,救助“两癌”贫困母亲199名,资助困境儿童962名;为9641名26岁-60岁农村脱贫妇女和低保妇女赠送总额达12.24亿元的女性安康险。